

88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

中国 文学 研究

第 8 辑

1986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文学研究(8)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6)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7印张 179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 10201·78 定价: 1.8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目 次

诗歌作品及作者评论

曹植和他的诗

伊藤正文 一

略论阮籍咏怀诗中的象征

方 介 八

全唐诗浅论

林玉雪 一四

评阿瑟·卫理《李白的诗歌与生平》

刘素玲 一九

天马行空的诗人李白

安 澜 二七

举杯邀明月——析李白《月下独酌》

沈 谦 三〇

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

简恩定 三二

诗歌理论

黄梨洲的诗论

王明荪 三九

严羽诗论与江湖诗人之关系

黄景进 四五

变文评析

伍子胥变文及其来源(第一部)(上、中、下)

David Johnson 六二

伍子胥变文及其来源(第二部)(上、下)

David Johnson 八四

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上、下)

肖登福 九六

补 白

诗坛上的姐妹花

陆 全 二六

管鲍之交

齐骋邨 二九

曹植和他的詩

伊藤正文·著
洪順隆·譯

歷史上，每當動盪的時代，往往會誕生像曹植那樣偉大的詩人。

時代動盪，總有殘酷事件隨著發生，尤其自後漢末年至三國這段期間爲甚。曹植的一生就是在這亂世的顛簸下過的。

就在這個時代，產生了理想的文學，即所謂「建安文學」，它長久地刺激後世詩人的創作慾。此時的文學背景雖充滿無限的惡意，但文學本身並不是因爲對那惡意的抗拒，才顯得特別出色。而是由於能深一層地去把握惡意所有者的意念，這是它了不起的地方。就因爲這樣，當我們面對建安文學時，在它突破文學的既成概念之後，可以感受到一股自由與奔放的情懷，並同時得以窺看到人生的深淵。這裡面，有文學家爲抵抗最大限度底生活而噴射出的強烈精力；有文學家爲創作而獨自冷眼凝視掙扎得精疲力倦的瘋狂底人像。他們爲此付出了焦思與苦慮，隨時將鏡頭轉向自己。在這層意義上，「建安文學」與閒暇的產品，真是霄壤雲泥，顯著成對比。

因此，吾人便不得不暫時把「建安文學的魁首曹操是殘殺過幾十萬人底罪人」的事實拋開；也要忘記那詩人代表曹植是劊子手的兒子這件事。

在這裡，我想介紹對曹植底兩種不同的評價。梁鍾嶸（四八〇？——五五二）「詩品」說：

「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

拿他和聖人周公、孔子相比，可謂無上的稱美。另外，是對他身爲貴介的一生，由朝廷所給予的評價。朝廷在他死後，賜諡「思」。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引「諡法」說：

「追悔前過曰思。」

諡語簡截，語氣之激，難覓其匹。就在上述兩種評價交織的地方，隱藏有他的文學和生平的秘密。

二

曹植，字子建。因他最後封號陳（河南省淮陽縣附近）王，又諡號思，所以據以稱呼——陳思王。

他在漢獻帝初平三年（一九二）出生，那時，他的父親曹操已卅八歲，母親卞氏，山東琅邪開陽人，出身倡家（「三國志集解」云：「所謂倡樂不似後世之淫樂賤流，又『夏侯惇傳』：『賜伎樂名倡，比於魏絳受金石之樂。』」其非卑賤可知。」），是位女中丈夫，一代賢媛，行事高雅。「世說新語」將他列入「賢媛篇」。曹植是第三胞胎，生時她已卅三歲，本是摸的妾，丁夫人被廢，她才立爲繼室。她終生愛植，呵護植，給植很大的影響。

子建出生地不明，譙（安徽省亳縣）是他的本籍，不是出生地。現在只好依「魏志」武帝紀的記載作推測，可能是東武陽（山東省朝城縣西），不然就是鄆城（山東省濮縣東）。這裡，我想簡單地敘述一下，他出生以前的歷史。

東漢自二世紀初就日趨衰微，內部官宦弄權，政治腐化；外部，黃巾作亂，民心不穩，帝國瓦解的徵象一天比一天嚴重。此時，由於漢室衰微，地方勢力增長，再加上皇位繼承問題：靈帝駕崩，辯繼立而爲董卓所廢，卓擅立陳留王協，即獻帝；不久，卓又弑辯及何太后。那正是中平六年（一八九）九月的事。翌年，袁紹號召天下諸侯討卓，膺任盟主，組織聯合盟軍，攻打洛陽，但因羣雄各懷心事，意志不一，討卓戰爭煙消，聯合軍雲散。於是羣雄割據局面

形成，亂事頻仍。

曹植誕生的那一年，董卓於挾帝遷都長安後，被呂布刺殺，呂布也為卓將李傕等追逼，秩序大亂，情況日形嚴重。當時，植父曹操還在袁紹羽翼下。操因破黃巾賊，名揚天下，接著以兗州（包括河北省西南部與山東省西北部）為根據地，全力擴充勢力範圍，獲得飛躍性的成就。這就是曹植出生前的背景。下面我們把他的生平分四個時期敘述。

第一期自初平三年（一九二）至建安十五年（二一〇），即出生至受封平原侯的前一年。暫時為這十八年取名為「修學時期」。

曹植出生後，曹操勢如旭日昇天。當然這裡面含有運氣的因素，但無可否認的，曹操本身也具有開創新時代的資質。他步步為營，鞏固地盤，到建安元年（一九六，植五歲），迎獻帝至許都（河南省許昌縣），受封司空，挾天子以號令諸侯。建安五年破袁紹於官渡（河南省中牟縣東北），建安十二年統一華北，十三年為丞相。

這期間，也曾嘗過幾次苦難和戰敗的滋味。尤其興平元年（一九四，植三歲），為了呂布，根據地兗州遭受侵略，幾乎覆滅，危殆萬分。幸有荀彧盡心保住鄆城以及范、東阿二縣，才得轉危為安。如果當時鄆城淪陷，城中曹植母子等的命運如何就難逆料了。和這次危機相較，歷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戰（二〇八），損失雖慘重，可是，當時基礎已固，恢復元氣就不算太難了。

這時期的曹植，沒有什麼事蹟可說。「三國志」本傳說他：「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雖然，帶點誇張，却可見得他小時那副神童模樣以及努力向學的神態。父親曹操本也是個好讀書的人，即使督軍前線仍手不釋卷，對兒女讀書自是督促有加。「好讀書」這一點，曹植可以說得自父親的遺傳，且不遜色。明帝景初年間（二三七——二三九）詔讚揚他說：

「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追錄陳思王遺文詔」）

可知，他也是一位「讀書破萬卷」的詩人。據本傳的記載，父親因為看他文章精妙，對他說：

「汝情人邪！」

懷疑他是請人代筆。

曹操對他非常寵愛，他那謙虛的性格，柔和的態度，不愛華美的個性，敏捷的頭腦，都是曹操打從心坎底喜愛的。

父親疆場得志，大拓國土，母親在他五歲時被立為正夫人。他也成為嫡子，生活的幸福可想而知。

同時，他和文壇的關係密切。

建安文壇——更正確的說，是以曹操為中心的文學集團——是在什麼時候？如何形成的？雖無法確定，不過據我推測，該是在曹操遷家鄆城（河南省臨漳縣西）後，即建安十年（二〇五，時曹植十四歲）前後。當然，那時只不過草創，會員以及各種條件都不很整齊。因為，這文學集團的代表人物七個人，即所謂建安七子，或鄆下七子；其中王粲、劉楨、應瑒等人都是在建安十三年（曹植十七歲）以後才參加的。曹操是人才主義者，正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所說：

「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

網羅優秀的文學家，幕下都是些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才俊。而且，他與文人相接，不像以往的君王將他們看作「吏人」、「俳優」。往往以文相會，交往平等。這種風氣對於富有文學才能的曹植，不能說毫無影響。前面說過，曹操曾經在看過曹植的文章後，問他是否是請人執刀，曹植跪下回答說：

「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

從他們父子的問答之中，透露了曹植與當時文學集團關係的一點消息。

這時期沒有任何可確認的作品留下來，藝文類聚卷五十五引他「文章序」云：

「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

這是他自編集子底序文的一部分，大概年輕時代的作品，都因「蕪穢」而被刪掉了，而那時節的文學歷程也可以從這段文章裡看出一些端倪。

第二期建安十六年（二一一）至建安廿二年（二二七），即受封平原侯（二十歲）到與曹丕集團繼位之爭失敗後（廿六歲）。這七年間，曹植深得父親

的寵愛，生活愉快，得天獨厚；可是與兄曹丕繼位之爭，使他的命運逐漸走入黑暗的胡同。在敘述這時期他的事蹟之前，我想對歷史背景作個簡單的說明。

曹操爲了鞏固華北地方，曾兩度出兵關中（陝西省）（其中有一次曹植曾隨行。）並且，和南方的孫權也處於戰爭狀態。可是，到了建安十九年（二一四）劉備領益州（四川省），天下三分的形勢已成，他又增加一位勁敵。其間，曹操官階遂自昇遷，建安十八年晉位魏公，建安廿一年封魏王。這一段期間，曹植的生活如何呢？

他在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平原，山東省平原縣），在任約三年。那時，他的異母兄弟有四人與他同時封侯，食邑五千戶，可見他並沒有特別得到優遇。兄曹丕同年封五官中郎將，任副丞相，兩者相較，曹植自然遜色多了。這時，他是否赴任，是個疑問。可能，名爲平原侯，却身居鄴都。

這三年間，鄴都新建銅雀臺已於一年前完成，曹操有一次命諸子登臺，叫他們各作賦一篇，曹植「援筆立成」，而且「可觀」（很不錯），曹操非常高興，大大地讚美他一番，不過，這件事並不如後人渲染的那麼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邢顗（？——二三）爲他的家丞，那是一位以耿直，德行聞名的好管家，以及當時二位代表詩人劉楨、應瑒前後爲庶子（地位在家丞之次）。據「邢顗傳」，由於邢顗對他嚴厲「防閑以禮，無所屈撓。」，使他心感不快而疏遠，轉而與投機的劉楨親絡。這種行動，連劉楨也覺得過份，曾寫信勸他說：「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建安十九年，植二十三歲，轉任臨菑侯（臨菑，山東省廣饒縣南），在任八年。這一年，謀士楊修、丁儀、丁廙（翼）成爲他的心腹，輔佐羽翼他，而他和曹丕集團的鬥爭突然激烈起來。主要原因是：曹操對他的寵愛，以及因而產生的對嗣子問題的迷惑。可是，其中關係微妙。第一曹植自己是否有意與兄長爭位是個疑問。向來對這個問題意見紛紜，但說者往往主觀偏袒（「三國志」的作者陳壽相當公正，真是難能可貴。）裴松之註以及「世說新語」都指斥曹丕不是位陰險冷酷的壓迫者。詳細的情形，這裡無暇敘述，大體說，他們都認爲曹植本應立爲太子，却因曹丕集團屢屢施下無恥的陰謀策略，終於強把曹植

整垮。此外，學者、文人偏袒曹植的較多。尤其隋的王通是位代表人物。在他所著的「文中子中說」（一說是偽書）中，力言曹植是君子，見識通達，讚美他是「讓天下」的人。明王世貞贊成這一說法，歸咎楊修等三人貪功，以爲曹植無意爭位。他認爲楊修等使曹植陷入困境，而曹操的寵愛有以致之（見「書陳思王植傳後」）。「魏志」說：

「植任性而行，不彫勵，飲酒不節。」

「註」據這一段文章，說植故爲奔放、輕薄之態，使父親曹操失望，故把太子位讓給丕。明李夢陽的意見也和上述的一樣，「三國志集解」著者盧弼註「魏志」云：

「無奪位之謀。」

可是對上述的「法官心證」言論澆冷水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極端的是郭鼎堂，他在「論曹植」一文中，謂曹植決不是「讓天下」的人，例證多端，言之鑿鑿。另有張德鈞也支持他的說法，著文呼應。（見「歷史研究」，一九五七、二）。

讀了上述的論說，使人不敢遽然下判斷。不過，事情的真相，當是黨徒與黨徒之間的權力鬥爭，而曹丕與曹植的瓜葛成分較少。再說得清楚些，曹丕繼承王位本是順理成章，禮法之當然；但是楊修、丁儀兄弟、邯鄲淳、楊俊、荀彧、孔桂等却利用曹操的情感活動，企圖擁立曹植，奪取王位；於是，曹丕的幕僚才出而應戰。這樣解釋該是較接近實情的。結果，曹丕這一邊，因得到曹真以下的重臣擁護，獲得勝利。在擁護曹丕這一羣人中，有曾經是曹植家丞的邢顗，以及曹植妻崔氏叔父崔琰等，這件事應是解開這鬥爭問題的關鍵所在，我以爲它饒有趣味。

這時期，正如年譜的記載，除了「離思賦」以外，還有很多作品。他與當時一流詩人劉楨、王粲、應瑒、應璩、徐幹（據「晉書」鄭袤傳，徐幹於建安十九年爲臨菑侯文學，侍曹植）等交往甚密，競作詩賦，爭相論戰。那正是建安文壇鼎盛的時候。亂世詩人那充滿沉悶憂鬱却又昂揚不已的抒情詩體，給予曹植以創作源力，拓寬了曹植詩的境界，濃厚了詩的密度。因此，建安二十二年，王粲、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等的死亡，對曹植是個巨大的打擊。他的

「王仲宣誄」一文，充分流露了這份感情。

第三期自建安二十三年（二二八、時植二十七歲）至文帝黃初七年（二二六、時三十五歲）。這九年間，是一向充滿生命力，得意非凡的時代的尾聲，接著來臨的是忍氣吞聲，迫害之影幢幢晃動的生活。建安二十四、五年，他的心腹楊修、丁儀兄弟被誅，這是災難降臨的第一記警鐘。從此，他的視線所及，真是黑雲密布，左右身邊充滿危懼氣氛。這時，本是企圖攀龍附鳳，以求榮華顯達的一羣，疏遠他，固是人之常情；可是連知己朋友也唯恐嫌疑上身，避不見面，他的身邊就此寂靜蕭瑟。更甚的是，黃初元年以後，一反往日，他不得不親自到封地赴任。當然，他只有向住慣了的，充滿親切感的鄴城、親骨肉，以及朋友告別了。

而且，封地還有朝廷的眼線，如影隨形，時時刻刻監視着他。此時，連酒都不能隨便喝。常因痛快一醉，醉時對使者（監視人）傲慢失禮，監視者就往上報告，向曹植問罪。當他到臨菑不久，即因醉酒，「悖慢劫脅使者」，貶爵安鄉侯（安鄉，河北省正定縣附近），同年遷「鄧城侯」（翌年，昇鄧城王），黃初四年轉雍丘王（雍丘，河南省開封附近），生活就如飄萍。那時節，日子就如他所著「遷都賦」序所說的：

「連遇瘠土，衣食不繼。」

真是窮苦極了。「王」、「侯」的名位聽起來好聽，實際情況却可憐兮兮的。「資治通鑑」卷六十九，黃初三年云：

「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又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爲匹夫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

他也在峻法（嚴厲的法律）之下，一度被長官以及監視人彈劾，境遇甚是難堪，深深的感嘆說：

「昔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爲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所誣白，獲罪聖朝，身輕于鴻毛，而謗重於泰山。」（黃初六年「令」）

本是上下融洽，了無猜忌的他，因爲被人誣賴，爲當時朝廷所疑，難怪要感到自己處境的脆弱，謗言壓力的沈重了。而曹植精神上的負擔如何，亦可想

而知。

再加上，黃初四年夏天六月，發生了一件可怕的意外事。和他感情要好的哥哥曹彰突然死亡（見「任城王誄」）。另一種說法，以爲文帝忌憚曹彰武勇，下藥毒殺他。由於境遇之危，哀悼之痛，而神經尖銳過敏，從此他備受死神影子的威脅。事後，所完成的「贈白馬王彪」詩，所以號稱絕唱，不是沒有理由的。

其他有關他的事，仍有種種說法，一說：直到曹操死以前，曹植仍有可能繼嗣；一說：曹丕時常心懷殺機，繼續對他施予壓迫（「七步詩」是代表性的事件）。這兩種記載，都是「心證」成分太濃所造成的結果，難免偏袒不公之議。這些論說的根據，不外「三國志」註或小說家言，可靠性非常薄弱。

這時期的作品和前期的相較，它顯著地帶有沉鬱悲愁的味道，作品中潛藏着真摯深刻對人生的思索。這麼說來，也許有人會以爲，有名的幻想構造「洛神賦」必然要從這一時期別開；可是，我仍以爲那是他苦悶的情感的折射，使他縱橫驅使絢爛的詞句，構築幽艷底幻想世界。賦本以宋玉「神女賦」爲藍本，取在洛水與女神宓妃歡會與惜別之情的主題，而全力所注，乃在描繪女神的超凡出俗，非人間所有。可是，有關「洛神賦」，古來議論紛紛。許多批評家說他修辭過於雕飾，浮華好色，偷襲宋玉的匠意。另一方面，袒護曹植的人，又說：女神即曹丕的象徵，賦中描寫的正是忠君愛主的至情。尤其，焦點所在，往往集中於女神的模特兒，以女神取材於甄后（兄曹丕的皇后）爲多，此說自李善註發端，其後，說者繪聲繪影，議論沸騰，上述袒護曹植的那些人，所以強調洛神暗射曹丕，理由也在這裏。

這時期重要的時事：有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的死，王朝的交替，以及黃初七年曹丕的死等三件。曹操、曹丕之死都是魏的大事，曹植遭逢父兄之亡，當是肝腸寸斷吧。有人以爲曹丕陰險至極，我却不以爲然。他既是一位明君，又是一位友愛的兄弟，尤其對曹植甚爲寬厚。曹植也始終敬愛這位兄長。他那篇「文帝誄」充分表現對哥哥的敬愛之情。王朝的更替是以禪讓的方式進行的，時延康元年（二二〇）冬十月。而實際上，權力早已轉移魏室，漢帝差不多是有名無實的存在，更替只是表面儀式的成文化，事務上的手續化罷了。雖然，有

一些傳言，認為曹植對漢室的滅亡悲傷不已，就如「魏志」蘇則傳那類奇妙的記載；可是，反證甚多，那些傳言不值得重視。這時，魏的敵國是吳和蜀，却没有大規模的戰爭，反而，吳蜀互鬥，情況激烈。諸葛亮上「出師表」，出兵漢中，與魏爭奪中原的時間在稍後的第四期才能談到。

第四期自明帝太和元年（二二七）至太和六年（二三二），即他的晚年，總計六個年頭。

這時期，他的生活日漸灰暗。遷徙仍舊頻繁，凌儀（河南省開封府）、雍丘、東阿（山東省兗州府）、陳等四地方，除了在東阿三年外，其餘幾乎每年調動一次。借他的話說：真是生活如「轉蓬」。最後，封陳，食邑三千五百戶，不過，管轄所及僅四縣而已。據「明帝紀」，是在十一月庚寅（二十八日，據陳垣「二十史劄記」）。

這時期，太和四年卞太皇太后的死，對曹植打擊最大。在困難災厄中，明裏暗裏呵護曹植的是母親卞氏。東漢以來，皇太后對政治的發言權加強了，所以，受到母親特別鍾愛的曹植真是太幸福了。由潮濕的雍丘遷東阿，也是因母親的說項才成功的。他在「卞太后誄」中所表現的，那份深切的哀悼之情，是超越乎一般母子感情的。

在晚年，他屢次上疏。最具代表性的是：「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前者希望參與政治，後者請准諸侯自由交往，文中表露了被疑慮及壓迫的皇族的苦心。其他表示關心政治的文章還有很多，他對政治的那份熱情，在這期間，一下子爆發出來。而且，論旨大都具體、公正。這可能是他在備嘗艱難困苦之餘，對於困苦的人民和切身體驗的事情有所確認吧！

但是這些上疏一點作用也沒有，他得到的報酬是絕望。既無知友可訴衷情，「常汲汲無歡，遂發疾癘。」本傳這句話，把他臨死前的模樣勾畫盡了。

這時期，他的詩大都是吟詠個人悲哀之情的篇什（可以「吁嗟篇」為代表），其他尚有與上疏有關的詩作。據推測，確定這時期作品的「怨歌行」，就有這種傾向。詩中自比周公，擬明帝為成王，真是意味深長。其他，像「泰山梁甫行」之類，具體而實在地描寫庶民荒涼生活的作品，當也是屬於這時期。在他所有作品中，最能傳達他的影像，可以說是他的自傳的，應是「薤露

行」和「吁嗟篇」二首。下面我想大略地對建安文學作個介紹。

三

「建安文學」的前驅東漢文學，它的主流是賦不是詩。東漢的賦繼承西漢由司馬相如（BC一七九——一一七）、揚雄（BC五三——一八）等大賦家完成的辭賦，兩者之間，在內容形式上並沒有多大的變化，魏晉賦在某種範圍內也可以說是騷賦傳統（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復活，技巧更加洗鍊，對句的使用更多，它是六朝駢賦的先驅，曹植「洛神賦」就是最好的代表。因為與騷的傳統有密切的關係，到了建安以後，賦的篇幅簡短化，內容抒情化，這類作品，以王粲「登樓賦」最為有名，曹植也有「秋思賦」、「九愁賦」等哀傷的作品。這和以敘事為主的漢賦恰成顯著的對比。建安文學在抒情表現上有劃時代的成就，而賦在這文學抒情化的發展過程上，擔任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依我的想法，東漢的張衡留下了一些抒情作品，他在文學史上應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別是對曹植的影響非常之大。

賦的發展大體如上述，可是，建安時代更值得重視的前代文學遺產，該算是定型的五言詩以及形式不定的樂府。

就五言詩來說，首先浮現腦海的是「古詩十九首」。這些詩，作者不明，自技巧上看，是經過文人潤飾，創作時代可能是東漢末年。大部分敘述男女離別之情，也有怨恨生活困苦，更有不堪生活之苦而產生厭世之思、享樂之意的作品。無論如何，都以抒情為主，用樸素而穩當的語言去表現那持續不斷，緊迫過來的哀愁。更值得注意的是：多數作品都令人感受鄉村風味並帶有溫雅、婉麗的風韻。這大概是民間歌謠經過文人潤飾後留下的痕跡吧。鍾嶸在「詩品」上品評古詩云：

「其體源出國風。」

可謂灼見。除了「古詩十九首」外，古詩尚有蘇武、李陵的作品（據說是偽作）等（兩人以外的也包括在內）十一首。

這些「古詩」給與建安詩的影響非常大，它不只是形式上遺傳給建安詩以五言的骨架；更重要的是，那含蘊充沛生命力底人類感情的內容，也帶給建安

詩以豐厚的營養，這是不可抹煞的一大功績。曹植如何學習古詩，可由「雜詩」其三、「七哀」等篇看出端倪，這種現象也可以在其他建安詩人的作品裏面看到。不過，建安詩與古詩也有不同，建安詩的改變是由溫雅而急切、淒婉；由單純而壯大、複雜；由樸素而纖細、緻密。五言詩此時已在文學領域中領得了身份證了。

東漢五言詩中，除「古詩」以外，也有確實是成於文人之手的，其中蔡邕（一三六——一九二）、秦嘉（一六〇左右）的作品，相當重要，不過對後世的影響不如「古詩」大。

其次是樂府，它是建安詩的母胎，最重要。建安文壇的創始人曹操的作品，至今還留存的都是樂府體裁；曹丕也以樂府為多。其他建安詩人，連曹植在內，也都有同樣的傾向，他的作品，徒詩（沒有樂器伴奏）的創製，也以樂府為基礎，這是不能忽略的事實。

這裏令人注目的是：建安的樂府是以東漢時特別發達的「清商曲」為骨幹的事實。清商曲（包含相和歌）是民間俗曲，它歌詠的調子澄澈清晰（王運熙「樂府詩論叢」）。曹操愛好音樂，他特別喜歡這種曲子。曹氏父子的樂府，清商曲特別多是理所當然的事。

建安樂府，還值得一提的，是它們的內容有時不用古辭，而有另一番新面目——寫時事。其中，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最有名。這說明當時詩人不拘樂府詩的舊形式，自由灌入新空氣。曹植的作品中，「雜曲歌辭」特別多，也是這種傾向的最好說明。理由是：雜曲歌辭本是近於清商曲的俗曲，因身份不明，無法確定所屬，才另立此類收容它，翻開郭茂倩「樂府詩集」，這類作品「雜曲歌辭」大多不理會古辭，自由創作，作品在曹植之後大量增加，正表示文學潮流的一端。

上面為敘述方便把古詩和樂府截然分開，其實，樂府如除去五言以外的部份，兩者的境界便不那麼截然不同了。多數古詩實際上是可歌的，這種例子很多，清朱乾甚至斷言「古詩十九首乃古樂府」。（見「樂府正義」）。總之，是否被收入樂府中才是它們異稱的主要原因。曹植的集子也因編者不同，而作品的分類有所差別。

建安詩人奠定了五言詩的形態，他們在向來不被列為正統文學的儔類（指樂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擁它入文學的寶座，功績之大不可謂不鉅。他們創造新價值的行為，的確也需要相當的精力、熱能。創造民謠的熱能足以決定新時代文學的方向。但是他們的詩並不是完全模仿民謠。這只要讀讀曹操或曹植的詩，就不難發現他們承受的文學遺產底範圍是如何底廣，正如前面敘述生平所說，他們父子同是手不釋卷，好學的人，這正是承先的工作。

前面說過，建安時代，五言詩已定型，其實這時期，詩人作着種種嘗試。傳統的四言詩，也因曹操「短歌行」、曹植的「朔風」，而裝滿新鮮的血液，傳播着全新的氣息。再說，曹丕的「燕歌行」，每句押韻，全篇七言到底，是現存文獻中，最早的一首七言詩，被推上七言始祖的位置。還有曹植「當事君行」是六言與五言交雜，而且又是隔句押韻。這種形式，決不是偶然成篇，他們必有一種確切的信念，即新價值的創造需要新形式；並且有一種新認識，即以文學為人生最後目的那種文學覺悟。曹丕的「典論」論文可以說是建安文學的文學宣言，文中明白宣告：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這宣言中蘊藏著建安文學的骨氣，飄浮着一股可怕的蠻勇。以學建安詩聞名的盛唐詩人王昌齡說：

「縱橫建安作。」

李白更高吟：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真是了不起的詩人。向來對建安文學的批評，往往是「慷慨」、「風骨」、「氣骨」。尤其，曹操父子喜用「慷慨」發其端（曹丕云：「文以氣為主。」是婦孺皆知的名言）。後代的人遂以為辨認建安詩人脊骨的標幟。前面所敘，已足以說明這一點，故這裏不再費唇舌。下面讓我切入主題，談曹植。

四

有關曹植，在前面敘述建安文學時已大體觸到重要地方。其實，說前面是

論曹植也不爲過。曹植是建安詩人中最有代表資格的人，幸運地，他比其他建安詩人年輕，一身兼備建安文學應有的要素。首先正確地指出這一點的是鍾嶸。他著「詩品」，把曹植放在最高級的上品說：

「其源出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女工之有黼黻。」

讚不絕口，用辭篤敬。當然，不能說它完全不是溢美。不過，他的文學觀正正確確地捕捉了曹植的文學特色——即精彩地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文學傳統，並大量地擴大了詩本身特有的可能性。

在這裏，我想談談前人論述不足或遺漏的地方。這些正是他和其他建安詩人所以有別，而爲他文學特徵所在。

第一、他的詩複雜多彩，境界廣大。這和他個人的生平有關：他出生於轉徙期，親身體會過激變的境遇；又有豐富的讀書經驗。再者，在文學方面，他饕餮地追求文學的可能性，一直到自己才能的極限。格局之大，可於「盤石篇」、「遠遊篇」看到一斑，而他作品的複雜多彩，只要透過整個作品羣就可一目了然。「白馬篇」的豪壯痛苦；「棄婦詩」、「七哀」的纖細；「贈白馬王彪」的莊重；「美女篇」的輕艷，真是風格多姿。又「朔風」迴曲錯雜，「泰山梁甫行」直率，應有盡有，任你喜歡。其他，謹嚴與奔放，永恆與刹那，神仙的肯定與否定，內容繁複，不勝枚舉。真是波瀾壯闊，疊嶂萬里，又充滿矛盾，齟齬。清王夫之所以說他通俗，真率，語帶貶斥，可能有感於此也未知可。作品這麼多變，在盛唐以前，他是唯一的詩人。不過，話又說回來，詩並不是多彩就可貴。還是不能不有貫透那多彩多姿的內涵。他凝視人生，根深蒂固，而產生了慷慨的精神。也可以說是不停地噴出慷慨精神的抒情，就是那精神所在。正如前面所談及，形式上如胡應麟在「詩數」外篇所說的：

「建安中，兼工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者，獨陳思而已。」

這並不是輕易就能達到的成就。他在「與吳季重書」中說：

「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

可見他對文章慎重之一斑。

第二、他的詩雕細緻，却極富流動感。這裏面有他獨特的寫實性表現手法，以細緻的筆法描寫靜止的對象，較適用於賦的創製，是六朝時極盛一時的詠物詩的方法。但當對象躍動轉變，作者也隨著對象的移動而變化時，自然會產生特別的，異乎前此的手法來。這並不意味他的描寫是無秩序的，我們毋寧認爲當自己與他物不斷轉變時，便不能不有更正確的秩序和嚴密的理論，貫徹整個作品。在這層意義上，曹植嘗試著，從流動不止的姿態上，尋覓出實在，這是他獨特的方法。例如「七哀」詩開頭：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這兩句詩句中，在推移的時間裏轉變着的空間底模樣，立體化了以後，被描寫出來。而且，它同時表現出女性的焦躁，在時間無情地消逝下，一縷柔思被無可奈何地拋置了的情態，隱隱可見。爲了想以固定化的文字去表現那流動不止的對象，不能不有卓越的技巧，正確地把握對象的能力，以及理論化了的字句排列。我們讀他的詩時，所以感到纖細和流動性，就是因爲他對這種要求的反應。這種表現法，諸如「雜詩」六首、「朔風」、「吁嗟篇」、「盤石篇」等也有，較早的「贈徐幹」、「名都篇」也可看到類似的跡象，這都是發人深思的現象。

第三、擅用「興」的表現法。「興」是「詩經」常用的修辭法，屬於六義之一。簡言之，在自然界發現所要歌詠底對象，而在詩的開頭，以高級象徵的姿態出現，這種修辭法就是「興」。前面說過，他爲了選擇適合於所要表現的內容底形式，煞費苦心，慎重其事；在這種細心的表現下，選用了「興」的修辭法，正是最主要的一種方法。他以這種方法去表現感情激流的噴射。如「雜詩」其一、「野田黃雀行」、「種葛篇」、「浮萍篇」、「盤石篇」等都是。吾人千萬不能忽略！上述的詩篇所以出色，他的條件之一就是因爲有「興」的表現法在。曹植使用這種表現法的事，首先由王昌齡「詩格」（「文鏡秘府論」引）指出，這正說明王昌齡獨具慧眼，以及受曹植影響之深。

此外，他學「詩經」時所用的原本，是個重大的問題，意味深遠。簡潔地說，他學的是「韓詩」。這在「情詩」、「贈白馬王彪」其六、「應詔詩」、「雜詩」等作品中，可詳細地見到它的消息。

略論阮籍詠懷詩中的象徵

方 介

一、前言

所謂象徵，是利用某種意象間接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或暗示某種不願直說的事務。這種手法在阮籍的八十二首詠懷詩中，運用極多，因此，阮詩素以難解著稱。鍾嶸詩品曾評曰：「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頗延年注解，佞言其志。」李善文選注亦曰：「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可見，歷來注家多不敢自詡能解其幽旨。

近人黃節、古直先後為阮詩作注，對於詩旨的抉發遠比前人大膽。他們多用史事相比附，指明詩中隱射的人事。雖然頗能幫助讀者了解阮詩的背景，却不免有所穿鑿，而限制了讀者的想像。

筆者以為，阮詩的寫作雖與當時政治、社會的背景密切相關，而未必一一有所隱射，縱有隱射，亦非其詩藝術價值之所寄。欣賞阮詩，首當注意者，為其象徵手法之運用，若能明其象徵意義，即可了解作者內心的世界。至於某詩某句究係隱射何人何事，實非最要者也。因此，本文探討阮詩中的象徵，雖亦論及時代背景，而不勉強加以比附，欲使讀者仍能聘其想像以入阮之內世心界耳。

二、阮籍在詠懷詩中運用象徵手法的原因

欲了解阮籍何以運用象徵手法作詠懷詩，首須了解他的生平與時代背景。

根據晉書阮籍傳推算，阮籍生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卒於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西元二一〇—二六三年），年五十四。他出生的時候，正是曹操當權，與劉備、孫權互爭天下之際。以後，曹丕篡漢，建立魏朝，劉、孫二人亦先後稱帝，三國之間仍不時發生戰爭。曹丕信任司馬懿，使掌大軍。明帝時，懿守關中，屢拒蜀漢之進攻，功績甚偉，益得明帝親重。景初三年（西元二三九年），明帝崩，遺命司馬懿、曹爽共輔年僅八歲之齊王芳即位。曹爽重用何晏等名士，共同擁護皇室政權，而欲削減司馬懿之威權。司馬懿乃於嘉平元年（西元二四九年）乘機勒兵誅除曹爽等人，獨攬大權。懿死後，其子師掌權，又於嘉平六年（西元二五四年）廢帝為齊王，改立十五歲的高貴鄉公懿。師死後，其弟昭繼續專政，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於甘露五年（西元二六〇年）親率宮中值僕討伐司馬昭，為昭黨羽所殺。昭復迎立常道鄉公奂即位。凡此

政爭事件皆阮籍生前得聞得見者。籍死後，不過兩年，昭死，其子炎即篡魏自立。

阮籍的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瑀為曹操所辟，任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死於建安十七年。籍三歲而孤，自幼即有奇才壯志。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性情倜儻，不拘禮俗，博覽羣籍，尤好老莊，嗜酒能嘯，善於彈琴，當時皆目為名士。

明帝時，太尉蔣濟慕名徵辟他，他加以婉拒，却被迫就職。不久謝病而歸。曹爽輔政，召他為參軍，他也以疾辭歸。司馬懿誅爽後，他被命為從事中郎，歷事師、昭兄弟。當時朝廷因他名氣大，欲予高官顯職，而他却以酣飲為常，不問世事，始終保持祿仕的態度。

司馬氏父子出身世族，標榜名教，而性情猜忌，多行權詐。為除異己，往往大肆殺戮。如誅曹爽時，黨羽皆夷三族，連女子之嫁他姓者亦不能倖免。廢齊王芳時，擁芳者亦皆夷三族。甚至如嵇康者，原未捲入政爭之中，只因不願出仕，不附司馬氏及其黨羽，即遭殺身之禍。足見當時誅戮之頻繁。阮籍與嵇康友善，同為不拘禮俗之名士。當時親附司馬氏者，多自謂為禮法之士，而實為虛偽小

人。因此，嵇、阮等名士，乃以違棄禮法的態度和他們畫清界限。史稱鍾會嘗訪嵇康，康不理睬，會懷恨而去，便勸司馬昭藉故殺康。鍾會又曾屢次拜訪阮籍，欲以時事問之，伺機加罪。阮籍都藉沈醉而獲免。可見，當時不願同流合污的名士，隨時皆有喪生之險。

阮籍因爲自幼而孤，母親撫養他成人十分艱苦，因此，出處進退之際都以全身遠害爲念，唯恐傷生累親，斷絕宗嗣。他之所以周旋於黑暗的仕途，敷衍司馬氏父子，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史稱司馬昭曾欲爲其子向阮籍求婚，阮籍乃大醉六十日，使其作罷。及昭受命爲晉公，加九錫，故示謙讓，朝廷公卿使阮籍作勸進表，籍又欲以醉推辭其事而不得，乃下筆爲之。亦可見他一面敷衍，一面迴避的苦心。

世說新語德行篇載：「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可見，嗣宗身仕亂朝而未遭殺戮，實以「至慎」之故。然，慎則慎矣，內心的苦悶仍須有所宣洩，故作詠懷之詩，以象徵手法間接訴其心聲，一則可免顯言獲罪，一則亦可舒其憤悶。吾人今日欲知其心，亦唯有藉其象徵以窺一二而已。

三、詠懷詩中的象徵

現存八十二首的詠懷詩，並非同時所作，其編排次序亦因版本之異而各有不同。今欲考其寫作年代與先後次序極爲不易，故難就此推求各詩之間確有何種聯繫。然可注意者爲，八十二首詩中所用的

語句，所寫的意象，以及思想、情感，頗多重複或相似之處，而這些重複，或是作者有意強調某種意念而爲之；或是作者潛在意念之自然流露，皆有助於讀者對詩旨的了解。因此，本文探討詠懷詩的象徵意義，即以此類重複或相似的語句爲其關鍵。唯因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列舉，僅擇要析論如下：

(一) 感時傷懷，有志難伸的苦悶

如前所述，嗣宗成年以後，是處於一個政爭激烈、權奸當道，而賢士君子命如危卵，進退兩難的時代。因此，在他的詩中，屢次出現「日落」的景象。如：「朱華忽西傾」（第24首），「白日頹林中」（第71首），「羲陽將欲冥」（第21首），「朝陽忽蹉跎」（第27首）等。這些詩句並非單純寫景，而皆有其象徵意義。茲舉數例分析如下：

(1) 「……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遠，白日隕隅谷，一夕不再朝，……」（第81首）

詩中感慨人生縱使長達百年，也有日落西山，與世長辭的一天，可見「白日隕隅谷」象徵了生命的殞落。

(2)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人生若塵露，天道竟悠悠，……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第32首）

由最末兩句避患之意，可知「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象徵着世局已由盛而衰，因此人生如塵露般朝不保夕。

(3) 「寒門不可出，海水不可浮。朱明不相見，奄昧獨無候。……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第66首）

水經渭水注引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司馬氏父子於明帝崩後相繼執政，皆是「劍履上殿」，顯有不臣之心，而有負明帝託孤之意，因此，嗣宗感慨地說：「出了北極寒門之外，是一片黑暗，縱使欲像孔子說的：『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是無處可去。在這黑暗的時代裏，見不到光明，……先帝崩殂未久，已有帶劍之人踏上他的陵墓。想起鬻桑的餓人，因爲趙盾一飯之恩，而救了趙盾的性命，相形之下，真是令人感傷啊！」可見，所謂「朱明不相見」，象徵着時代的黑暗與魏室的衰亡。而當時一般人士之道德氣節普遍淪喪，亦於此可見。

(4) 「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與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第8首）

這首詩指責當權的朝士只知奔競弄權，而不知遇禍的危險。就好像「黃鶴」一樣，雖然飛得又高又遠，卻沒有歸宿。因此，他寧可與「燕雀」爲伍，而不隨「黃鶴」高飛。可見，詩首四句並非單純寫景，「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是指魏室初衰之時，尚不覺甚寒。「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則指司馬氏當權後，不顧親附者便如風中寒鳥，只能瑟縮地相依。

綜合以上四例可知，「日落」的景象，象徵了生命的殞落，時代的黑暗，道德氣節的淪喪與魏室的衰亡。

在這魏、晉即將易代的當兒，嗣宗對於司馬氏父子的跋扈不臣，是頗為不滿的。而對於魏室之衰則表現了哀悼與眷戀之情。因此，詠懷詩中屢言「大梁」、「魏都」及「三河」。「大梁」是戰國時魏都，「三河」見於史記貨殖列傳：「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亦是王者都城所在之處。都城是帝權的表徵，都城的盛衰可以見出朝代的興亡，嗣宗言此，實有其象徵意義。茲舉數例分析如下：

- (1)「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共工宅玄冥，高臺造青天。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肆變陵世俗，豈云永厥年？」（第29首）
- 詩中寫遊梁所見是一片荒涼，並且慨歎世變俗衰。
- (2)「徘徊蓬池上，還願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第16首）
- 這首詩更具體描繪了還望大梁所見的荒蕪，而詩末特言小人、君子之分，並表明自己不惜孤獨、憔悴、不願同流合污的心願，可知所詠大梁暗指當時的魏朝。

(3)「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艷姿美，光華耀傾城。豈為明哲士？妖蟲諂媚生。輕

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使媚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第75首）

詩首所謂「梁東芳草」，應是指魏之羣臣。遺憾的是，榮極一時，顯耀無比的大臣，皆非明哲之士，而為諂媚小人。詩末「路端使媚子」即點明了「芳草」之所指。可見，此詩亦詠當時的魏，對於變節的魏臣表示了不齒。

(4)「鴛鴦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第31首）

戰國末年，秦兵攻下大梁，梁王被虜，魏國遂亡。詩中悲歎梁王歌舞荒淫，而不求賢講武，招致滅亡，實藉以歎曹魏之將亡。

(5)「周鄭天下交，街衢當三河，妖冶閑都子，英耀何芬葩？……傾城思一顧，遠視來相誇。願為三春遊，朝陽忽蹉跎，盛衰在須臾，離別將如何？」（第27首）

詩中感慨京城雖曾盛極一時，而轉瞬衰亡，亦無可奈何。所謂「朝陽忽蹉跎」即象徵了魏室之衰，其證已見前。

綜合以上五例可知，詠懷詩中對於「都城」的感慨都象徵了對於魏室的悲悼，而由他的「徘徊」、「還願」、「南望」、「願遊」，又可見出眷戀的情懷。

魏室的衰落，時代的黑暗，是因為權奸、小人的情懷。

的惡勢力在摧殘一切，就像秋天裏寒冷的風、霜，使大地一片蕭條。因此，詠懷詩中悲秋之句頗多。例如：「開秋聲涼氣，蟋蟀鳴床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第14首）「殷憂令志結，……蟋蟀在戶牖……」（第24首）「鸛鳴發哀音，……悽愴傷我心……」（第9首）等，都象徵他對時代的憂傷。而「寒風」、「凝霜」屢見於詩中，則是惡勢力的表徵。例如：

(1)「清露為凝霜，華草成蒿萊，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第50首）

「凝霜」使「華草」變為「蒿萊」，就像所謂的君子，經不起打擊，變成了小人。

(2)「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蠶，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第3首）

「秋風」帶來的是零落與憔悴，「凝霜」覆蓋大地時，微弱的野草，豈能不被摧折？詩人感慨一身不能自保，欲捨已生荆杞的「堂上」而去，可見，所謂「秋風」、「凝霜」都象徵了摧殘時代的惡勢力。在惡勢力之下，繁華變為憔悴，君子變為小人，朝廷裏賢者難以容身，而不肖者競逐祿位。因此，嗣宗又用象徵手法描寫了這些情形：

「桃李」、「木槿」象徵著無法長久的繁華與生命，例如：

(1)「……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榮榮？……」（第18首）

詩中既言窮達，又言死生，「桃李」當指榮華與生命。

(2)「儔物終始殊，修短各異方，……熒熒桃李花，成蹊將天傷。……自非凌風樹，憔悴烏有常？」(第44首)

桃李成蹊是禍害的開端，榮華富貴往往惹來殺身之禍。

(3)「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聲折似秋霜，……」(第12首)

安陵與龍陽皆為戰國時代以色列主之嬖男，寵極一時。此詩所謂「桃李」即指美色與榮華。

(4)「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路側。……」(第71首)

(5)「墓前榮榮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連颺隕其葩。……」(第82首)

木槿花朝生夕隕，又多種在墓前，象徵著人生的短促與易逝，無論會有多少榮耀，轉眼亦皆成空。

「蒿萊」、「荆杞」象徵著衰世的混亂與荒蕪。例如前文所引「賢者處蒿萊」(第31首)、「華草成蒿萊」(第50首)，皆有此意。又如：「堂上生荆杞」(第3首)暗示祠堂之上一片混亂，而「……逝者豈長生？亦去荆與杞。……是非得失間，焉足相譏理？……」(第52首)意謂逝者雖未能長生，然而，能够離開這個是非不分，處處荆棘的亂世，也就足以自慰了！

「黃鶴」、「高鳥」象徵著飛黃騰達的顯貴，而「燕雀」則指位卑職低的官員。嗣宗被迫仕於亂

朝，不願顯達，所以說：「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第8首)然而，傾身營求一飽的燕雀，又豈是他所願做的？因此，他一再為自己的處境悲哀。例如：

「……高鳥翔山岡，燕雀棲下林。青雲蔽前庭，素琴懷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第47首)

他真正嚮往的生活是如山間鳴鶴般自由而脫俗的。

「玄鶴」與「鳳凰」才是他自身的寫照。他說：

「……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鷦鷯遊，連翩戲中庭？」(第21首)

「中庭」即庭中，象徵朝廷之中，與第3首所謂「堂上」同，而成羣戲於庭中的「鷦鷯」，則指羣臣。

「玄鶴」志在「雲間」，而不在「庭中」，寧可一飛冲天，遠離污濁的亂世，那時，也就不再哀鳴了。可見，「玄鶴」象徵他那高舉出塵的壯志。他又說：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栖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旋？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第79首)

說文云：「鳳，神鳥也。……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翔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現則天下大安寧。」鳳凰非醴泉不飲，非梧桐不棲，具備了聖賢君子的品德，可為天下帶來大安寧，嗣宗以「鳳凰」自喻，可見他以君子自期，

有濟世之志。無奈，秋風一起，鳳凰摧折，困處亂朝的他，既不能使天下太平，又不能翱翔四海之外，內心焉得不感憤恨？

晉書阮籍傳曰：「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正因為他忘不了少時澄清天下的大志，面對著沒有希望的時代，才會慟哭不已，酣飲為常！他作詩回憶著：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第15首)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坰。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第61首)

少時的他，不僅是以做儒家的聖賢自勉，而且有志做沙場上的英雄。然而，生不逢時，他的「長劍」，他的「詩書」，始終沒有機會發揮，又豈能不遺恨呢？

「長劍」是誅除惡勢力的象徵。面對權奸橫行的亂世，他多麼盼望揮劍除奸！他說：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滌滌。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第38首)

儘管旱災、洪水肆虐大地，他要像后羿射日般舉起弓箭，用險峻的泰山把長劍磨利，來平定天下。又

說：

「危冠切浮雲，長劍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
度跨一世……」（第58首）

屈原涉江曰：「帶長欽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王逸注曰：「言已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
。」嗣宗高跨一世之志可與屈原相比。然而：

「拔劍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
我三江旁……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勢
路有窮達，咨嗟安可長？」（第25首）

劍，擋得住白刃，却擋不住讒言。權奸的勢力，又
豈是一劍所能揮除？他只好「揮袂撫長劍，仰觀浮
雲征」（第21首）「翱翔觀彼澤，撫劍登輕舟。」
（第63首），把壯志寄與浮雲與輕舟。「撫劍」正
象徵他有志難伸的憤懣。

難伸的壯志與憤懣，使他中夜難寐，唯有「彈
琴」宣洩。他說：「素琴懷我心」（第47首），又
說：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
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
何見？憂思獨傷心。」（第1首）

「彈琴」吐露了他的心聲，然而，知言何在？他像
「孤鴻」一般，在黑夜裏徘徊、傷心，唯有「明月
」、「清風」可以為伴。

「明月」、「清風」象徵著高風與亮節，在空
庭裏，在曠野中，它是孤獨者唯一的安慰。「多言
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輝。
」（第14首）亂世中，賢者焉能不寂寞、不孤獨？

因此，詠懷詩中，處處都是孤獨的寫照，例如：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出門臨永路，不
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
北飛，離獸東南下，……」（第17首）

由堂上到路上，乃至登高望野，皆不見人，這真是
極度的孤獨與寂寞。

「登高望遠」是企盼的表徵，也是渴望超離現
實的表徵，詠懷詩中屢見，如：

(1)「……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
岡，萬代同一時，……」（第15首）

(2)「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
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李公悲東門
，……」（第13首）

(3)「朝登洪坡顛，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
羣鳥飛翩翩，……」（第26首）

仲長統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墳。
」詩中所謂「松柏翳岡岑」，也是「丘墓蔽山岡」
之意。登高所見，皆是墳山、曠野，「曠野」象徵
了世上的荒蕪，益使人感到孤單無依，他只有另尋
自我安慰的途徑了。

(二) 飛昇成仙，遠遊隱居的安慰

黑暗的權勢，像一面大網，從天而下，籠罩著
整個世界，沒有人能够掙脫。嗣宗感慨地說：「天
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生命無期度，朝夕有
不虞……」（第41首），他無法掙脫現實的桎梏，
只有藉著想像，使心靈自由飛翔。他說：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抗身青雲中，
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第43首）
在幻想中，他已隨著鴻鵠飛上青天，再也不受網羅
的羈絆了。

「飛昇」象徵了自由與逍遙，傳說中的神仙，
莫不能乘雲駕霧、自由翱翔。因此，「飛昇」、「
成仙」的幻想，是他痛苦之時最大的安慰。他說：
「……世有此輩，茫茫將焉如？翩翩從風飛
，悠悠去故居，離騷玉山下，遺棄毀與譽。」
（第57首）

山海經西山經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他盼望
自己能够隨風飛翔，遊戲於玉山之下，遠離人間是
非。又如：

「世務何縈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
露待太陽。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濯
髮陽谷濱，遠遊崑崙旁，登彼列仙嶺，採此秋
蘭芳，時路鳥足爭？太極可翱翔。」（第35首）

世路崎嶇，人命易逝，他期望自己能够攬住日神的
車子，不讓日頭西落。前文曾論，「日落」象徵了
生命的殞落，時代的黑暗，與魏室的衰亡。此處「
願攬羲和轡」正可見出他對延續生命，挽救時代，
重見光明的願望。然而，只有神仙才有能力攬住羲
和之轡，因此，他幻想著置身仙境，自由翱翔的快
樂。

仙境，在他的想像中，是一個光明、和諧、沒
有爭端與憂患的世界。他說：

(1)「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

雲蓋覆天網。仙者四五人，逍遙宴蘭房。寢息一純和，呼喚成露霜。沐浴丹淵中，炤耀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瀆去高翔。」（第23首）

(2)「橫術有奇士，黃駿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愁我腸？一去長離絕，千歲復相望。」（第73首）

仙界沒有黑暗，永遠照耀著日月的光華。他所嚮往的神仙，或是四、五人一起，過著和諧無爭，逍遙自在的生活。或是獨自駕著馬車，從海上的神山，飛奔至晝夜常明的丹丘。他們沒有世事的羈絆和煩惱，也沒有死亡的威脅，那是黑暗的現實世界所無法比擬的。

仙界的幻想，能予他暫時的安慰，終不能使他獲得真正的解脫，他說：

(1)「昔有神仙士，乃處射山阿，……可聞不可見，慷慨嘆咨嗟。自傷非鸞類，愁苦來相加，……。」（第78首）

(2)「……列仙停修齡，養志在冲虛，飄飄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第41首）

多少人去採藥，却不見有人帶回仙藥。仙界，終不是凡人所能企及，使他重又墮入黑暗的現實中，益感愁苦。

「遠遊」的願望，是他失望之餘的另一種寄託。他說：

(1)「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翱翔觀彼澤，撫劍登輕舟……」（第63首）

(2)「……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第32首）

(3)「……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濟渭間，鞍馬去行遊。」（第66首）

(4)「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棄夸與名……」（第30首）

他不知自己將去何方，却欲登上輕舟，騎馬驅車，快快遠離世患，拋開醜陋的現實。前引魏氏春秋曰：「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他畢竟脫離不了網羅的桎梏，面對著末路窮途，也只有慟哭而返了。

「種瓜」、「采薇」的隱居生涯，是遠遊不成後的另一種希望。他說：

(1)「寒門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持瓜思東陵，黃雀誠獨羞，……」（第66首）

(2)「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第6首）

既不能浮海遠行，持瓜之時就想起東陵侯邵平，邵平種瓜的地方不遠，就在青門之外，瓜田在陽光照耀之下，也算是閨世的一處光明。因此，他深深嚮

往布衣的生涯。縱使不能像邵平一樣逍遙衣食溫飽的種瓜生涯，能像夷、齊一般「采薇」於首陽，也是他所甘願。他說：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慙愴傷我心。」（第9首）

就連采薇而食的貧寒生活都無法企及，又豈能不傷心呢？

「飛昇」、「成仙」、「遠遊」、「隱居」，畢竟都只能在他的幻想中實現，而不能使他獲得永久的安慰。在他的筆下，這些幻想象徵著他對自由、逍遙、光明、和諧的嚮往，也象徵著他對遠離憂患與桎梏的渴望。

四、結 論

「文藝是苦悶的象徵」。阮籍用象徵手法充分寫出了他的苦悶，令我們深深受到感動。他的苦悶一方面是時代造成的，一方面也與他個人的學養才性有關。如果他能力挽狂瀾，他可以以不痛苦；如果他能潔身遠引，他也可以以不痛苦；如果他願同流合污，他更可以不痛苦。然而，他既不能力挽狂瀾；也不能潔身遠引；更不願同流合污；於是，只有苦悶，沒有出路。這樣的苦悶，並非頹廢，因為，高潔的品格始終透著光輝，照亮了黑暗的俗世。正如鍾嶸所說：「可以陶性靈，發幽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詠懷詩的價值是可以不朽的。